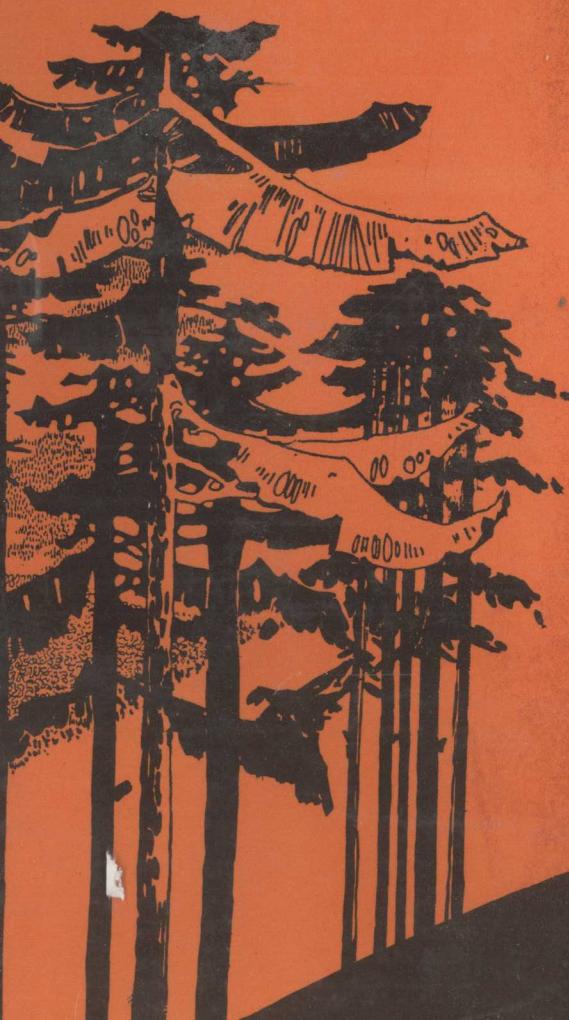


# 遼北革命

中共鐵嶺市委黨史研究室  
鐵嶺市民政局編



# 目 录

任輔臣烈士传略	(1)
石瑛烈士传略	(32)
王彭烈士传略	(40)
白子峰传略	(43)
王铸烈士传略	(49)
周建华烈士传略	(53)
赵进扬烈士传略	(61)
高爾华烈士传略	(69)
刘國培烈士传略	(93)
高希林烈士传略	(95)
常隆基传略	(97)
赵永江烈士传略	(105)
王一峰烈士传略	(108)
邱含光烈士传略	(111)
吴斌烈士传略	(117)
安郁斌烈士传略	(118)
孙西林烈士传略	(121)
张文祥烈士传略	(130)
于树忠烈士传略	(135)

张强烈士传略	(137)
刘卓人烈士传略	(142)
赵景广烈士传略	(154)
毕凯烈士传略	(155)
贺炯烈士传略	(161)
张殿忠烈士传略	(162)
刘营昌烈士传略	(165)
许芝烈士传略	(169)
纪恩荣烈士传略	(175)
胡远豪烈士传略	(176)
巢立人烈士传略	(184)
李秋来烈士传略	(188)
高恒烈士传略	(192)
陈建础烈士传略	(197)
芦周友烈士传略	(200)
郭克烈士传略	(208)
关起义烈士传略	(213)
吕明仁烈士传略	(218)
孙玉和烈士传略	(234)
戴宗池烈士传略	(240)
陈树棠烈士传略	(244)
王德新烈士传略	(249)
赵世柱烈士传略	(251)
马洪来烈士传略	(258)
傅忠仁烈士传略	(264)
邓正才烈士传略	(268)

赵光明烈士传略	(271)
孟士明烈士传略	(279)
孙开义烈士传略	(282)
陈敬美烈士传略	(285)
赵连才烈士传略	(287)
宁明德烈士传略	(290)
吴钦刚烈士传略	(293)
许刚烈士传略	(295)
杜守义烈士传略	(300)
刘汉章烈士传略	(304)
田登科烈士传略	(309)
佟双久烈士传略	(314)
鞠文科烈士传略	(316)
戴昊烈士传略	(317)
编后记	(326)

# 原书缺页

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任家祖籍山东泰安，清初闯关东来到东北，先落户在新民，后定居铁岭县银州城内。任家在铁岭虽非望族，但也不同于普通人家。任辅臣的曾祖父任杰，幼年就读于著名的学府银岗书院，中年中举人，娶妻吴氏，亦出身于当时铁岭满族的显赫家族；祖父任万选为人仗义疏财，富有正义感，曾资助过昌图农民起义领袖“滚地雷”，因此被官府关押，出狱后举家搬到河夹心乡下，任家殷实富裕的生活到这时已开始逐渐衰落，仅有的十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度日；任辅臣兄弟二人，排行第二，其父任有德粗通文字，豁达正直，立身处事不安于现状。祖辈们特有的思想、性格对任辅臣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河夹心村地处辽河西岸，地势低洼，十年九涝，生活艰难。任辅臣五岁那年的夏天，家中十几亩田地被洪水淹没了，当年颗粒未收。其父任有德只好卖掉田产，领着全家流落到铁岭县城，在城西南（现银岗小区一带）盖了三间小房，靠拾破烂或在三道街贩卖秫秸、瓦盆为生。任辅臣从此就开始帮助父亲和哥哥干活了。到他年满7岁时，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他上学，其母只好把他托靠给舅舅吴秀才，免费上了私塾。舅舅在铁岭虽然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但也常常失业，他一失业，任辅臣也就失了学，这样断断续续地读了五年私塾。

任辅臣自幼天资聪颖，10岁时能做一手好风筝。他制作的大型蜈蚣风筝，不仅精致，而且放得比别人高，每年春季在银州城墙上举行风筝比赛，他总是名列一、二。1896年，家境稍有好转，12岁的任辅臣考入了其曾祖父曾读过书的银岗书院。他努力钻研，勤奋好学，学业大有长进，眼界不断开阔。

1899年，根据中俄密约，沙俄当局开始修筑经过铁岭的东清铁路支线，在银州城内招收雇员。为了缓解家里经济的困难，15岁的任辅臣应召做了一名录事（即书记员），从中学会了俄语。两年屈辱的雇员生涯使任辅臣进一步接触了现实，沙俄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清朝地方当局的极度腐败，穷苦百姓生活的日

益艰难，使他内心产生了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责任感。1901年，他毅然离开现有工作，官费考取了奉天警员教练所。在这里，他发奋学习，刻苦锻炼，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成长为一名有思想、有学识、有本领的青年。1902年，18岁的任辅臣毕业回到家乡铁岭，在县警察署当了一名警官。第二年春天，与银州城内张含光女士结婚。

1892年，任辅臣8岁时，其父任有德在工夫市与泥塑匠人张混沌偶然相遇，二人虽初次见面，谈得却很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位泥塑匠人后来便成了任辅臣的岳父。二人在小酒馆喝了几盅，心暖耳热之际，竟贸然为自己彼此年幼的儿女订了亲。这一年，任辅臣未来的妻子、张家唯一的女儿张含光也只有8岁。虽然事后两家都觉得有些唐突、懊恼，但十几年后，张含光却真的成了任辅臣人生和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妻子和战友。

任辅臣自幼尊敬父母，长大后由于在外读书，思想比较开放，主张男女平等，但是他母亲任吴氏却很封建。他结婚不久，一次张含光不小心碰坏了新婚时佩戴的耳环，婆婆严加责备，性格倔强的张含光竟倒在炕上不吃不喝哭了两天。母亲大发雷霆，逼着儿子管教妻子。任辅臣未能遵命，只是以耐心的沉默回答了母亲。夜深人静之后，他对妻子说：“西方讲男女平等，咱们中国很快也会这样，你们女子要自立就得硬朗起来，遇事要有个主张，别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在任辅臣启发下，张含光不久便报名参加了平民劝学所，成为破除封建观念、带头入学的几位女性之一。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内忧外患，苦难深重，已经陷入极度危机的深渊之中。1904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挑起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大连至长春段，把铁路两旁的大片山林、土地划为附属地，享有种种特权，肆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东北人民倍受战争之苦，腐败的清朝政府竟然无耻地宣布“中立”。这黑暗的现实

进一步激发了青年任辅臣心中救国救民的使命感，也使他加深了对社会、对局势的思考和认识。必然中的偶然，使他走上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就在日俄战争这一年，战火很快蔓延到铁岭，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决定任辅臣一生道路的事情。有一天，他碰见两个俄国士兵正在抢夺中国农民的苦房草，那个农民不给，被一个俄国兵用枪托打伤了手腕，另一士兵则端起马刀向农民的胸部刺去。目睹这种强盗行为，任辅臣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与两个未加防备的俄国士兵厮打起来，其中一个被打翻在地，另一个凶狠地挥舞马刀向他砍来。就在这紧急关头，一位名叫瓦夏的俄国青年军官出来解围。原来，瓦夏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党员。他把任辅臣带到屋里，问他为什么要打俄国士兵。任辅臣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打伤了中国的老百姓。”瓦夏问：“要是他们去打中国的‘戈必丹’（当官的），你又会怎样呢？”任辅臣愤怒地回答：“他们不会的，中国要是没有那些无能的、卖国的‘戈必丹’，你们根本来不到中国。”瓦夏听了他的话，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对！太对了！其实，俄国老百姓同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意打仗，是那些当官的老爷们和皇帝才想这样做，要想消灭侵略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卖国求荣的‘戈必丹’。”

瓦夏的一席话，好像星星火种，倾刻间燃起了青年任辅臣胸中的燎原大火。他得到了社会民主工党思想的启迪，知道这是一个为平民百姓谋利益的政党，从此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这以后，任辅臣又结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俄国军官，在他们的影响下，决心投身革命实践。

## 二

1905年下半年，任辅臣奉命调离铁岭，去新民县警察署任副署长，不久便结识了驻守在新民陆军新军的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同他们一起探讨过孙中山的学说。后来，看到他们收编胡子，产生了看法上的分歧。虽然他赞成同盟会的主张，但并

未加入。

1907年，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任辅臣毅然放弃了警官职位，经瓦夏等俄国青年军官介绍，来到当时俄国占据的中心城市哈尔滨，在东清铁路护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这时，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制度的腐朽、军阀统治的黑暗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解剖；对如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无产阶级思想更加成熟了，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了。1908年，24岁的任辅臣秘密加入了被当时社会上称为“穷党”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誓言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终生。这是任辅臣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位原苏联记者在记述任辅臣生平时这样写到：

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他受到了在那个时期来说是不错的教育，通晓英语、日语和俄语；看来他了解了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他于辛亥革命之前在中国工人中间组织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1910年前后的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日趋腐朽，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军阀统治更加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沙俄反动当局控制下的哈尔滨，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活动十分艰难。这个时期，任辅臣与军官学堂及铁路上的俄国青年军官交往密切，经常同他们一起去三十六棚铁路工厂与工人开会到深夜。从他们偶尔流露出的紧张神情，妻子张含光看出这其中似乎有一定的危险性。果然不出所料，在他们组织了一次“五一”游行后，就有一些青年军官被逮捕。张含光越发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几次询问，任辅臣总是悄声说：“我干的是一件为天下穷人能出头露目的大事情，细情将来再告诉你吧。”不久以后，便发

生了沙俄霍尔瓦特集团勾引土匪枪伤任辅臣的事件。

1909年夏季，东清铁路沙俄当局逮捕了几名在军官学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之后，很快发现了任辅臣的革命活动。但因他当过警官，与哈尔滨中国当局的某些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不便正面对他采取行动，就以卑劣手段暗中买通了中国土匪，趁他去道外浴池洗澡之机，隐藏在门后突然开黑枪。任辅臣胸部中弹，右手掌被射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用左手握枪英勇还击，土匪落荒而逃。可是，沙俄反动派并不甘心，企图趁他在铁路医院养伤之机继续加以迫害。在这紧急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军官学堂具有正义感的中国教官也竭力帮忙。张含光连夜赶制了一件白大褂，买了大口罩，化装成护士，第二天中午，趁俄国护士吃饭之机，背起丈夫混出了医院。逃出虎口的当天夜里，任辅臣告诉妻子，他已加入了为天下受苦人谋利益的党，并决心为此奋斗终生。

任辅臣一家在铁路工人掩护下秘密逃到齐齐哈尔。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11年，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指派下，任辅臣通过原警员教练所老同学的推荐，出任黑龙江省警察总署的巡逻队长。当时沙皇政府趁我国军阀混战之机，对我边界进行无所顾忌的蚕食，任辅臣率领巡逻马队，受命于我方堪界代表宋小濂，负责巡察黑龙江沿岸中国一线以及外蒙边界。党给他的任务是掩护被沙俄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潜渡到黑龙江越境避难。1912年，沙俄反动政府发现一个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犯”被中国巡逻队掩护起来，便向当时的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发出通牒，限中国行政当局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越境人犯，并引渡任辅臣到俄方受审，否则就向黑龙江南岸中国一方开炮。宋小濂当即将任辅臣逮捕起来，并关进模范监狱死牢。但由于他平时对任辅臣非常器重，加上地下党组织及同学同事和妻子张含光的全力相助，宋小濂表面上了一道通缉令，暗中却把他送到位于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出任水

上警察局局长。任辅臣在这里照常接受党的指示，除继续转送、掩护布尔什维克“政治犯”外，还经常越过绥芬河出境，到指定地点参加党的秘密会议，传递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和宣传材料，受到党组织的高度信任。他信仰坚定，百折不挠，以“星星之火燃成烈焰”的革命精神，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活动到哪里。他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已经锻炼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革命工作者。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掩护自己的身份和行动，他不惜改变生活方式，时常出没于戏院、赌场、烟馆和茶房，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能有更多的机会，以各种方式广泛接触社会上各阶层的头面人物，深入他们中间，伺机开展工作，宣传革命真理；而一到晚上，任辅臣则抓紧学习、研读革命理论，直到深夜。有一次实在困了，手拿书本睡着了，书倒在蜡烛上起火，把被褥烧着了，他才猛然醒来。

1913年，任辅臣奉调哈尔滨，任税捐局局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无力出兵，根据协定，只能以派遣华工到协约国后方作劳工的方式参战，一时间大批华工流入欧洲，仅去俄国的就达几十万人。任辅臣深刻认识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冷静地思考了下一步路应该怎样走，党的工作如何开展。他决心到俄国去。

1914年底，由俄国富亚公司在哈尔滨召募两千名华工到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采伐木材劳动。这时，任辅臣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也接受了中国行政当局的指派，他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华工总办的双重公开身份，率两千名华工来到俄国乌拉尔地区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一年之后，经历了几场生与死、血与火考验的张含光，也不避关山险阻，离开铁岭老家，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追随丈夫到了俄国。实际上，任辅臣把自己的一家都献

给了革命事业。

一位原苏联作家在记述任辅臣这段经历时写到：

是什么东西使他登上旅程？是金钱、某种希望、见见世面或年轻气盛？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是他理解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在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阿拉巴耶夫斯克是乌拉尔地区一个新建的小城，位于原始森林地带，是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华工们在临时用原木搭成的简陋工棚里居住，潮湿黑暗，空气混浊，环境艰苦。森林区象小靖蜒一样大的蚊子成团，叮在身上疼痛难忍，并流出一股股黑血。华工们终日劳动，吃的是黑面包加盐粒，几乎没有蔬菜，水质又极差，许多人生了病，而且劳动条件极为原始，没有什么劳保措施；伤亡事故不断发生。资本家和工头层层盘剥，工人工资十分低廉，生活毫无保障。任辅臣为改变工人兄弟的悲惨境况而积极奔走。一方面组织华工团结自救，盖屋、种菜、战胜困难；另一方面反复与俄国当局和矿厂主交涉，努力改善华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因而深受华工们的信任和爱戴。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也深刻理解丈夫工作的重要意义，经常深入华工中间，关心他们的食宿冷暖，成为任辅臣的得力助手。那时矿区蔬菜奇缺，入春后张含光亲自带人到山里采摘山葱、山蕨菜、山白菜、山胡萝卜等野菜。为了保证安全，每发现一种新菜，她总是抢先尝尝，感到没有危险再推广给大家。当时华工治病也很困难，张含光利用小时候学来的药材知识，组织人员采集草药，又在华工中物色几个懂些医术的人组成医疗小组，巡回于木场、矿区，为工人治伤治病。对重病号她亲自掏钱送到城里医院。张含光所做的一切有力地支持了任辅臣的工作。

1915、1916年的俄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沙俄反动当局对革命活动控制极严，既使象边远的乌拉尔地区也不例外。任辅臣到俄国后一直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着单线联系，联系人乌斯钦科，恰好是任辅臣家的家庭女教师的丈夫，他很少与任辅

臣直接联系，党的指示和任辅臣的工作汇报大都由女家庭教师来传递。1916年，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召集会议，给工人们上文化课，并讲述列宁的著作，宣传工人阶级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道理；他把俄文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去，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这一年冬天，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场主不履行合同，无故扣发华工的工钱，任辅臣组织了一场以取缔非人待遇为目标的华工大罢工。场主们觉察到罢工与他有关，便上告到彼尔姆省反动当局，当局警察以“组织暴乱嫌疑犯”的罪名，把他软禁起来。但警方并未查出更多的证据，加上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张含光联络彼尔姆省较有地位的华侨联保，软禁很快解除了。任辅臣组织的这场罢工使华工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坚定了同资本家斗争的意志，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

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两年，任辅臣以他科学的思想理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具体的斗争实践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初步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华工队伍，并在旅俄华侨中广交朋友，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和走向革命。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帮助下，十月革命前一年，任辅臣就开始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了大量准备。主要是筹集资金，通过彼尔姆的一些知己华商分批买进一些枪支弹药。因为资金有限，他又秘密组织华工在炼铁厂打制了许多大刀片，并且也储备了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他曾对妻子张含光表露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蓄革命力量，待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广大穷苦百姓。实践证明，任辅臣既有思想家的风范，又有实践家的品格。

必须记述一笔的是，任辅臣作为一个革命事业的献身者、杰出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他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对

于妻子张含光和子女们来说，他是可爱的丈夫和可敬的父亲。他的长子任栋梁 1988 年在给苏联朋友写的一封信中这样回忆到：

“1915 年同妈妈和姐妹们一起来到阿拉巴耶夫斯克我爸爸那里。爸爸为我们（我和姐姐）请了两位女教师……在阿拉巴耶夫斯克，我们生活得很好、很愉快……夏天，我们全家曾到森林中去吃野餐……并在犹如地毯般的草地上翻跟头；冬天从小丘山上滑雪橇，打雪球仗……”

任辅臣热爱生活，却从不沉湎于生活。身为国外交署的官员、华工总办，他自律极严，自奉甚俭，坚忍克己，境界高尚，成为一家人学习的榜样和华工们爱戴的领袖。

####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陷入极端混乱之中，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1917 年俄历 10 月 25 日，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震撼全球的阿美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俄国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向全世界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给各国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革命先驱者任辅臣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盼望已久的大革命终于到来，他激动不已，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早有的远大理想更加坚定了，决心在革命的圣地培育革命的火种。他把俄文报纸译成中文，向华工们宣讲：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我们全体华工目前立足俄国，将来回到祖国，以列宁为榜样，终有一天受苦受难的同胞也能得到解放！

华工们听了任辅臣很有号召力的讲演，深受鼓舞，一片欢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任辅臣迅速组织全矿区近两千华

工参加红军，编入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据原苏联档案记载，十月革命前后，在苏俄的中国国际主义者达20万人，其中有几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任辅臣率领的中国团很有影响，是苏俄红军中最大的中国国际主义者部队之一，受到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

中国团的兵源除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华工之外，还有纳杰日今斯克、彼尔姆等地的中国工人，后来又有东部战场布柳赫尔部队的中国战士并入该团。任辅臣任团长，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派来一位红军干部任政委。中国团由三个营组成，长期追随任辅臣的河北人张清萧、山东人桑来朝、东北人潘百川分别担任一、二、三营营长。他们同其他华工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硬汉子，后来在战斗中都牺牲了。任辅臣正是率领这些从前从未拿过武器但却具有无限精神力量的华工们参加了红军。1918年5月24日，《乌拉尔工人报》在有关中国团的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华工们接受采访时表达的思想：

“我们中国常常发生革命，但我们穷人依然被当作是傻瓜，获胜的只是当官的。在俄国，穷人掌握了政权，这是真正的革命。俄国工人和农民处境困难，应该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俄国的穷人也会帮助我们，那时地球上就会出现天堂，人们将友爱真诚地生活。”

华工们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这些朴素而深刻的理解，同任辅臣长期的引导、教育是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那么热情地欢迎并积极地投身于这场革命，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任辅臣率领这些爱憎分明、特别能战斗的华工经过短期培训后，立即开往前线。

那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局势极端严峻，从她诞生那天起，便遭到国内外敌人的激烈反抗和破坏。一方面，彼德格勒

的士官生发生叛乱，前线大本营最高总司令杜鹤宁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命令，策划叛乱等各种危急的形势威胁着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国际帝国主义企图把俄国继续捆在战车上，利用战争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苏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卫国战争。

当时的东部战区形势最为险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十分猖獗，从西伯利亚大本营沿铁路线向西发动强大攻势。坚持在东部前沿的中国团，在团长任辅臣率领下，配合苏俄红军，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中国团与白匪军的第一次战斗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一个村镇展开。本来，白匪军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对中国团的战斗力缺乏足够的估计。任辅臣抓住敌人骄狂已极的弱点，集中兵力，趁夜出击，攻其不备，快速突破，一举全歼该镇守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白匪军遭此打击，恼羞成怒，声称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一攻即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保卫矿区的任务，任辅臣带领全团战士加强戒备，在主要地点挖战壕、设岗哨。一次，白匪军一部前来偷袭，中国团采取扇面式合围战术，四面出击，大败敌人，有力地打击了白匪军的嚣张气焰，并因此获得上级的嘉奖。

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评论说：

“中国军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从1918年春季到秋季，任辅臣率领中国团转战在东部战区的几个战场上，活跃在杜拉河、卡马河一带，与敌人大大小战斗近百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受到苏维埃中央的表扬与嘉奖。特别是在阿克塔伊河附近，中国团摧毁了数倍于我的敌人进攻，并乘

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著名作家、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军报编辑帕维尔·巴若夫曾经指出：“高尔察克的报纸散布了那么多关于中国国际主义者的谣言，是因为惧怕他们。”1918年8月1日，《乌拉尔工人报》这样报道：

“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之一。”

但是，1918年东部战区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高尔察克白匪军攻势凶猛，步步逼近，苏俄红军的战线逐渐西移。

中国团组建之后，由于战事频繁，伤亡日渐增多，任辅臣决定把部队分成前方和后方两部分，作战部队由他指挥。在相对安定的第二线成立团后方办事处，由其夫人张含光主持，主要是负责安置伤病员及随军家属，运送给养，接纳各地投奔中国团的流散华工作为补充兵员，组织新兵进行短期训练。当时前方战士吃不到蔬菜，一旦负伤，伤口很快化脓，很难愈合。为了阶级兄弟，在任辅臣、张含光的大力动员和感召下，后方办事处的人员和所有能勉强行动的伤员，一有空闲，便到野外采集蘑菇和其它各种野菜，送往前线。

1918年春，随着战线的西移，中国团后方办事处迁到杜拉河畔的库什瓦城。任辅臣长子任栋梁至今仍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

“办事处设在资本家的一幢楼房里，资本家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后院的大花园里栽有许多果木树，枝头上还残存着去秋未落尽的几片枯叶，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还有未融尽的残雪。办事处共有二十多人，我母亲作为负责人终日忙碌着……前方战事频繁，伤亡较重，新兵经短期训练后即开往前线参战。我当时还是11岁的孩子，也跟随新战士们上操训练，还用马枪打过靶呢。”